

文藝的任務及其他

孫禹

舊約全書及新約

新舊約

新舊約



## 目 次

論「趕任務」

三

備考：略談魯迅先生的趕任務【魏金枝】

三

再論「趕任務」——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之探討

三

傾聽普通讀者的批評

三

略談新人物（紀念高爾基十五周年忌辰）

一

『生命是比死更強的』——（讀伏契克遺著）

七

致許傑先生信

八

武訓歌頌者的思想基礎——改良主義，它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上

起了什麼作用？

八

論領導和批評（讀夏衍同志關於『武訓傳』問題的檢討後）…………… 101

關於研究魯迅先生底小說的一點意見…………… 二七

附錄一：關於『魯迅小說講話』【許傑】…………… 二八

二：孫伏園作『五四運動和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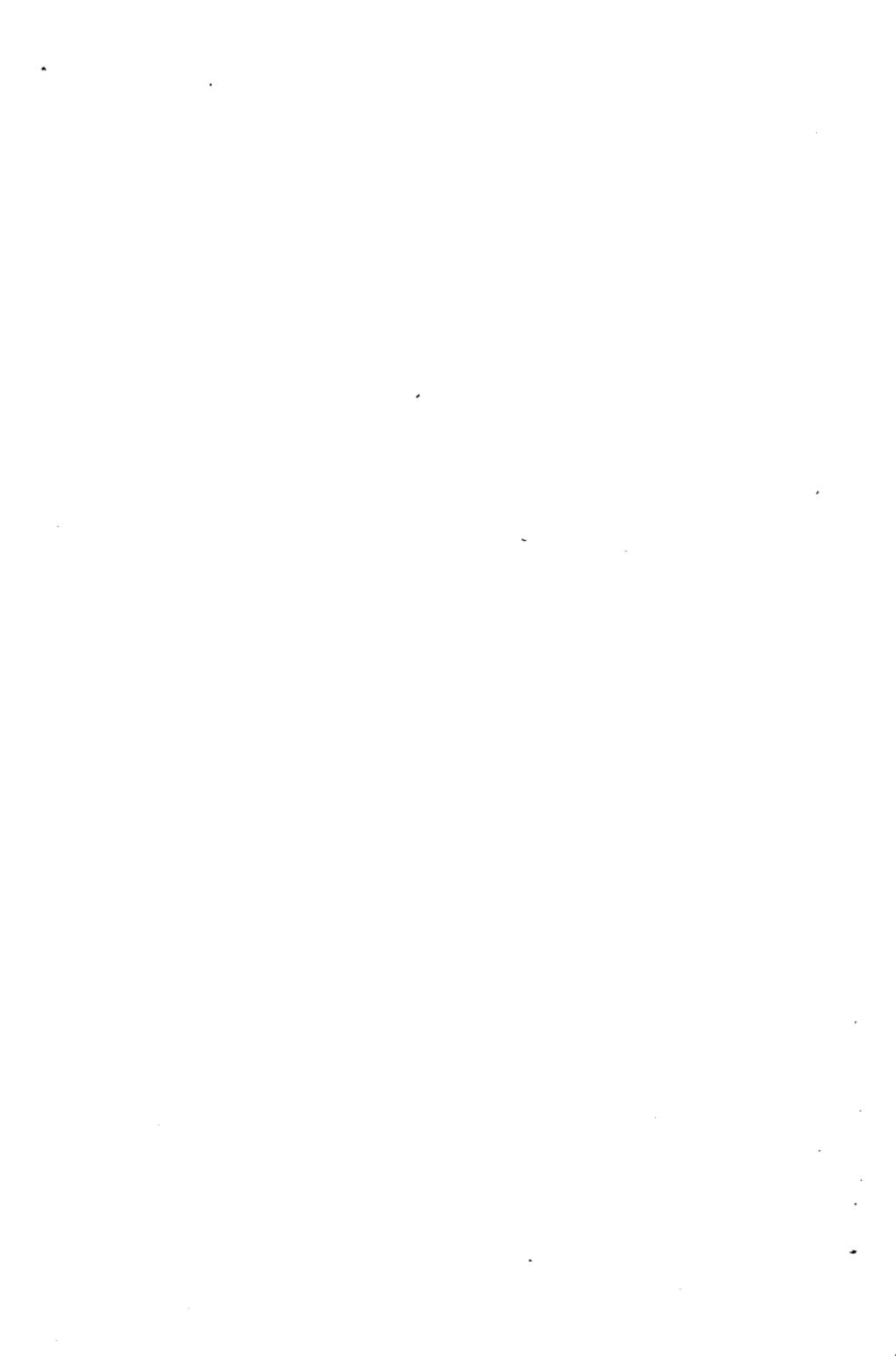
一文及其『檢討』摘抄…………… 二九

略論藝術和歷史問題…………… 三〇

向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學習…………… 三一

後記…………… 三二

文藝的任務及其他



## 論『趕任務』

三十三期文藝報提出了關於『趕任務』問題的討論。

有些問題其實是毋須討論的。比如：『該不該趕任務？』有了『任務』當然該『趕』；多有『趕』的作家，至少表示我們文藝界對於爲人民服務這個課題是尊重的，是熱情的。

正如爲人民服務是光榮的，有『任務』可『趕』也是光榮的。

然而『任務』而必須『趕』，却又正是文藝界的可惋惜的地方之一。

或曰：形勢發展是這樣迅速，每一個新的形勢都向我們提出具體任務；因而每一具體任務的提出，總帶有迫切的時間性。比如『抗美援朝』的任務，既不能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以前就提出來，也不能到十二月才提出來，因爲我們既不能憑着熱情

衝動去決定一個政策，一個具體任務，也不能遠落於現實發展之後去放馬後炮。因此，我們的作家當然談不上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以前就預爲『抗美援朝』的任務作什麼具體的準備，在提出這個任務的時候好來一個迎頭碰上；這就不能不等到這個任務下來之後再趕。

但誰也不能向作家這樣要求。事實是作家們不但在十一月四日民主黨派聯合宣言發表當時，而且還在其後一段長時期內，對『抗美援朝』這個具體任務還感到突然，感到措手不及，『趕』得很勉強，而且『趕』不上。

既然存在着這樣的事實：我們的作家遠落於政治形勢發展之後，那末，『任務』來了，除了索性不聞問之外，就不得不『趕』了。爲了『趕任務』，急急忙忙地隨便搪塞、拚湊一下，好去交卷，這樣當然不會創作出什麼好的東西。有些人，當人家提到他『趕』出來的作品時，就謙遜地，同時也心安理得地，聳聳肩說：『這算是「趕任務」嘛！……』——這也就並無足怪了。

並且，即使『趕』上了某一具體『任務』，而沒有『趕』上這個時代，而沒有

『趕』上這個時代的本質的、全部的、內在的聯繫和矛盾，而沒有『趕』上這個時代的發展動力和方向；那末，可以斷言：這樣還是非失敗不可的。我們也會看見一些配合了當前的具體任務的、好像不算太壞的作品，但這些作品却很快地失却了它的生命，隨着政治形勢的轉變，或者僅僅是在這一具體任務由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的時候，就像昨天的日曆一樣撕了下來。——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裏。

問題就在於我們文藝界（其實也不止是文藝界），對於我們祖國和人民的觀察、了解，本來就不會達到歷史地、全面地、深刻地的境地。

還是比方說『抗美援朝』這個具體任務罷。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中湧起了無數的新的愛國主義英雄。但是，難道可以說，無論在朝鮮前線英勇作戰的人民志願軍，也無論在後方的城市和鄉村中堅決支援起示範作用的典型人物，是十月的某一天才從天上掉下來的嗎？難道可以說，在此以前，以至上溯至一百年來反帝反封建鬥爭、遠溯至創造我們祖國光輝歷史的人民，從來就不具有愛國主義、為正義而慷慨犧牲、為理想而奮鬥到底的偉大英雄氣概，而是在一個早上突然發生的嗎？

當然不是！那末，爲什麼我們會在接受了『抗美援朝』的具體任務之後，特別是在各界一再強調愛國主義教育之後，才發覺我們過去並沒有獲得（或不夠）這個普遍存在了幾十年、幾百千年的東西？

這只是證明：我們文藝工作者（也不止是文藝工作者），雖然生活在現實的世界上，却正如俗語所說，『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活在人民當中，却沒有認識到中國人民傳統的高貴品質。或者是我們從來沒有（或很少）認真地研究過、發掘過；或者是，我們也會去研究過，但是由於我們的片面性和盲目性，終於沒有得到什麼收穫。

我們祖國偉大人民從來就具有愛國主義、爲正義而慷慨犧牲、爲理想而奮鬥到底的偉大英雄氣概。過去如此，今天更加昂揚了；而且明天，它仍然是，永遠是我國偉大人民勝利地完成一切新任務的力量之無窮盡的源泉。如果我們的作家，在創作『抗美援朝』的文藝時，能夠通過典型的創造，完全地、正確地、而且以優美的形像肯定了這個東西，歌誦了這個東西，而且以科學的卓見指出了它的方向；那

末，我們的後輩，有什麼理由不去喜歡它、學習它呢？那末，毫無疑義，它將像蘇聯文藝中的許多不朽巨著，如母親、鐵流、夏伯陽等等，將不僅記錄了當時的鬥爭史，不僅在當時發生了巨大的力量，而且永遠教育着祖國和世界的人民勇猛前進。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樣，那末，具體的政治任務，將可以給我們以認識上和創作上以幫助；不過不再是『趕任務』，而是文藝與政治的必然的、同時也是完全自由的結合。

就是在今天，在我們文藝界存在着上述缺點的時候，通過具體的政治『任務』，通過對於以當前具體任務為中心而展開的全面深入的羣衆運動，這個羣衆運動所激發，所推進的人民的英雄主義等等，所作的認真而且科學的研究、學習，並且在具體的研究、學習中鍛鍊了和提高了我們對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把握，對我們祖國和人民作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有科學預見的（而不是匍匐在地面的自然主義的）學習研究，並且好好地把過去和今天『趕任務』工作中失敗的和若干成功的經驗作出總結，以提高自己的工作，——毫無疑義，這樣

的『趕』法，必須我們作巨大的、長期的、艱苦的努力，但必將使我們獲得巨大的益處，將使我們終於能夠獲得我們所迫切需要的東西，即：以一個卓越的政治家同時亦即是優秀的文藝工作者的獨特方法，去洞察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中我們祖國和人民的高尚品質和其獨創的風格，並以充沛的勝利信心面向光明美滿的未來。

然而可惜，我們還有些作家，用『趕任務』這個幌子，把自己的缺點掩飾起來，把糾正自己的缺點的責任放棄了。而且這現象，還不是個別的。這除了說明對於政治『任務』根本沒有什麼莊重的理解之外，對於文藝本身說來，也是一種毫無責任感的、墮落的，為人民文學所不能容忍的行爲。文藝界的一切人們，特別是批評家們，有責任去澈底地克服它。

——五一、三、十七，上海。

## 【備考】

### 略談魯迅先生的趕任務

魏金枝

文學工作者應否趕任務的問題，是討論得很久很久的了，照理應該結束，應該有一個結論。但不久以前，却還有人憤激的說爲是文學的『沒落』。——彷彿擔心文學因爲趕任務而就要沒落似的。這些憤激的人，有些還自稱是魯迅先生的學生，但一接觸到實際問題，便露出自己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真面目，把魯迅先生的平生言行，擋在一邊了。

證據是擺在我們眼前的，魯迅先生不但不反對趕任務，還『每寫些小說之類的文章，以敷延朋友們的囑託』，而且遵奉着命令，以趕他的革命任務。他老老實實的說過，他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圓和真的指揮刀。』這就是說，他服從真理。服從真理，就是他最大的自由，因此他以此爲榮，以此爲樂，決不想在真理以外，再劃出一個小天地，去滋長他的自由主義。

不但這樣，他還遵奉着命令而改變他的創作方法呢。他說過，爲了主將的命令，爲了

不願將自以爲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青年，他就在樂的夏瑜的墳上，添上一個花圈，在明天裏不讓單四嫂子做夢。這在魯迅先生，也並不以爲是沒落的。因此他說，他的所以如此，只是爲了『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顯出些亮色。』這是很顯然的，魯迅先生在當時就覺到，世上固然多的是黑暗，却也有着光明。而且這一綫的光明，在他最早的作品一件小事裏就顯示出來，而在故鄉的結尾裏，就提出只要走的人多，路便要被走出來的明確的說法。這就是說，他不但遵奉命令，而改變他的創作法，而擺在他面前的現實，也同時要求他怎樣去趕他的任務的。

自然，我們不容易趕好我們的任務，這是事實。但也只因爲我們沒有具備趕任務的條件——沒有基本的知識，沒有生活的經驗，沒有熱烈的愛憎，沒有明白的是非，而更主要的是，我們還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的對於自己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作鬥爭的勇氣。只要我們有勇氣，爲人民服務的勇氣，參加生活鬥爭的勇氣，學習真理服從真理的勇氣，容或暫時趕不好任務，但到底是可以趕得好任務的。魯迅先生就是我們最好的榜樣。

自然，愛倫堡的話是對的：沒有創作的衝動，不要寫作；不能寫作的人，不要冒充作家。但我以爲，在這裏最主要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在魯迅先生生前，他也是反對空頭文學家的，甚至在臨終遺囑上，還諱諱的告誡妻子。然而也只是反對空頭文學家，並不是

把文學家一筆抹煞。他的所以反對兒子做文學家，就因為他兒子不喜歡這一套，然而照過去文壇的情形，只要父母兄弟是文學家，那麼他們的一切親人，就會很容易被夾進文學的世界裏去，而結果，却一定就成為魯迅先生所反對的空頭文學家，因此他是反對的。但假使他兒子真的寫出了偉大的作品來了，我以為他是決不會反對的。這在他的愛護文學青年的事實上可以看得一清二白的。因此我以為，他所反對的是幫兇的「民族主義文學」，是幫閒的花邊文學，是以『革命』嚇人的文學，以至於沒有作品的空頭文學家。我以為，假使當時也有只掛魯迅的大旗，而以趕任務為沒落的文學家，也必然是魯迅先生所要反對的。

這樣說，也就涉及到寫作的衝動上去了。作家而沒有寫作的衝動，實在是非常奇怪的。假使他對帝國主義、地主、反革命分子，沒有高度的憎惡；對人民沒有由衷的愛，自然是不會有什麼創作衝動的。即使為着金圓，衝動也並不會怎麼強烈的。再說，作家忙，他沒有工夫寫，或是他沒有經驗，寫得不好，那也不在此例。但說既已具備了條件的作家，而對這樣翻天翻地的沸騰着的新社會會沒有衝動，甚至因趕任務而沒落，那是欺人之談。就以魯迅先生為例來說罷，魯迅先生在他大寫雜文的時候，幾乎是每天都要寫一篇的，而且都是應景而作，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依照趕任務會是沒落的說法，魯迅先生的雜文，就應該是草，而不是牛奶了，但魯迅先生的雜文，又是人所共仰的，連反對趕任務

的朋友，也並無例外。就是魯迅先生這樣謙虛的人，他也把被擠出來的文章，當爲牛奶，他是並不輕視他的趕任務的工作的。

自然，魯迅先生也是反對口號文學的。他把作品後面的口號，曾經當爲老虎尾巴。那並不是說老虎尾巴不好，或是沒有力量。却是因爲文章的本身，好似癩皮的狗，全靠這尾巴來裝場面。但他這樣的警策我們，却也並不抹煞一切處在萌芽狀態中的作品的。不說別的，就說當時左聯的機關刊罷，它的名字，就叫做『萌芽』。而發表在這刊物上的作品，自然也是萌芽狀態的，離他自己的尺度遠得很，然而魯迅先生在聽了很有人喜歡那些作品的時候，他是衷心地高興的，他就當面鼓勵我們去寫作。這就是說，我們的文學，必須向現實主義的方向前進，要從實際出發，逐步的向上提高。這也並不像某些心急而又目空一切的教條主義者那樣的。

總之，去在生活裏鬥爭是應該的，去拿先進的理論來學習是應該的，去在創作的實踐中鍛鍊也是應該的，但更應該的，却是爲政治服務，爲人民服務，爲真理服務，在此以外，是沒有什麼自由的。

——載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九日上海解放日報。